论李大钊早期的进化唯物论

刘 伟

李大钊的哲学思想分为三个时期：急进民主主义时期，也可以称为进化唯物主义时期或早期；从急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时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也可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期或后期。前期从1912年6月他写下目前搜集到的第一篇论文《隐忧篇》开始，至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之前为止。本文仅就其早期哲学思想的进化唯物论部分作一概要分析。

一、进化论与中国近代哲学概观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提出者董仲舒明确地说：“道者，为世亡弊。”他假托远古“圣人”之名，说这个“道”“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①后来，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一步步将“道”升华为永恒的“理”，使“天不变，道亦不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不可侵犯的神圣信条，谁要是对它提出一点怀疑，就会被视为非圣、大逆。时间跨入中国近代，虽然有人私下里对它提出疑问，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之前，它仍然居于独尊的地位。

近代的许多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频频入侵之下致力于探讨西方强盛、中国衰亡的原因。有人提出“中国重精神，西方重物质”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办实业，重物质之声激扬，当时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如此。但办实事未使中国摆脱被瓜分的厄运，因此有人起而重新分析中国与西方差异的原因。例如，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尖锐指出，那种认为“中国之智虑远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中国虚矣，彼西洋尤虚。”^②在他看来，西方所以船坚炮利，国力富强，在于他们有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基本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康有为、严复等人开始大量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

为了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于贫困、被瓜分的境地，康有为、严复等人非常重视从西方引入先进的世界观。他们在西方哲学之林漫游的结果，是将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自然科学基础生物进化论移植在中国的土地上。严复一方面在《原强》等论文中盛赞达尔文主义，一方面在其译西书活动开始就翻译了赫胥黎、斯宾塞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康有为也依据其当时掌握的一些粗浅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及哲学知识，阐述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进化问题。他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就有一部漫长的演化史，它从太阳脱胎出来之后，“与天空气相磨，积久则凝成外壳矣，如牛乳流出，即凝成面层焉。盖以高热为熔岩，渐冷为岩石，积之日久，则外壳积层厚矣。然地心火力沸动，不能闭塞也，故爆出而为火成石，天空之水蒸汽相遇遂成为水，而水成石出，岩石层遂裹焉，渐流而为川，为海……”^③地球上的生物也是经过了草木、鸟兽阶段才发展到人。他还将这种自然进化观移入人类社会，导出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公式，声称人类历史必须严格遵循这个

公式“循序而行。”^④

康有为、严复等人介绍、宣传的进化论，一反中国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方法，为沉闷的中国思想界吹入一股清风。一时间，“天演”、“进化”之言辞溢于报刊。可以说，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先进思想家无不受其影响。鲁迅先生在1907年曾经讲过：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与人类以考察自然与人类历史一具锐利思想武器，从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发展至海克尔，后者“总会前此之结果，建官品之种族发生学，于是人类演进之事，昭然无疑影矣。”^⑤陈独秀在1915年写的文章中，称进化论是近代文明三大特征之一：“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⑥

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李大钊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在批判地吸取前人与同时人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以“自然进化、历史进化”思想为显著特征的进化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二、进化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⑦依据对“思维与存在谁先谁后”问题的回答，哲学家分别站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阵营。

在李大钊之前，虽然康有为、严复等人讲自然的进化，并且引用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为自己的“自然进化观”张目，但他们在解答“进化着的宇宙本体”是什么问题时，却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在康有为看来，“元为万物之本”。^⑧何为“元”呢？他认为，“元”与客观物质不同，它是不可见不可思议的抽象本体。他在《大同书》中说道：“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全神分神，惟元惟人。”^⑨即是说，“元”本质上就是“神”，说“元”构成天地，实质就是说“神”生天、生地、生人。这是典型的唯心论。

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首先批判了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唯心论，指出：“历稽中国、印度、及至欧洲之自古传来之种种宗教哲派，要皆以宇宙有一具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曰天，曰神，曰上帝，曰绝对，曰实在，曰宇宙本源，曰宇宙本体，曰太板，曰真知，名称虽殊，要皆指以大主宰而言也。由吾人观之，其中虽不无一二叶于学理的解释，而其或本宗教之权威，或立理想之人格，信为伦理之渊源而超乎自然之上，厥学盖非生于今日世界之吾人所足取也。”然后，他阐述自己的观点说：“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以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其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⑩

李大钊的进化唯物主义自然观，包括了“运动是绝对的”含义。在他看来，“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⑪“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⑫综观其前期的众多论述，可以断言，他这里所讲的“奔流”、“进转”、“流转”等概念就是哲学上“运动”的概念。

关于时间与空间，他虽然已经涉及到时空的本质问题，但并未予回答（后期在《时》一文中则做了较深刻的回答），较多精力集中于论述时空的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在《青

春》一文中写道：“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若由极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惟其为万象万殊，故于全体为个体，于全生为一生。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⑭即是说，宇宙是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就一个时代、一个人、一个物体存在的时间来讲，它是有限的，但无数个有限累积起来便成为无限，“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恒性。”^⑭

李大钊同志在此时期的进化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同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他个人对此的掌握有着密切关系的。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大量涌入中国，中国许多学校已开设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课程。如，鲁迅先生在回忆自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学习情况时讲：“……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主要指物理、化学知识——引者），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一些本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⑮李大钊同志在1916年写的一文也谈到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普及的情况：“二十年以前，洋海始通，西学输入，缙绅先生尚持天动地静之说，而以为奇技淫巧焉。今地球环绕太阳之理，声光化电之学，虽在童蒙，亦粗知其义矣。”^⑯

但是，李大钊早期的自然观，虽然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涉及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运动观、时空观等，但缺乏系统、严格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它还受着中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影响。他在《今》中讲道：“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于无穷，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⑰宋代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者陆九渊明确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这个命题经扬简、王阳明等人的改造，在中国哲学史上流传甚广。就其强调人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而言，是应该赞许的，但它对事物的认识却是根本错误的。

尽管如此，李大钊早期的自然观，其主要成份仍是进化的唯物论。他在论述自然的进化发展时，将进化的主体视为“大自然”、“大实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展开了自己的认识论和发展观。

三、进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相对于自己的自然观及同时代其他人的认识论，李大钊对进化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探索是比较全面、深刻的。

首先，他认为不断运动进化着的客观世界是人们认识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批判了不可知论。列宁在分析赫胥黎的哲学思想时指出，赫胥黎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认为“我们唯一确实知道的是精神世界的存在”，他陷入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就是不可知论，他“认为唯物主义是不正当地超出‘感觉群’的‘形而上学’。”^⑱严复对于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十分欣赏，他在《天演论》按语中充分宣扬了不可知论及由此导出的唯心主义，认为哲学上的根本问题都是不可思议的，“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物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至于物理之不可思议，则如字、如宙。宇宙太虚也，宙者时也。他如万物质点、动静、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讫之伦，虽在圣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实不可思议者”。^⑲这种不可知论曾对中国近、现代的认识

论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如鲁迅这位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思想家，早期虽然强调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但却未识破不可知论。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他自己：“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单相信将来“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②0}

李大钊同志认为这种不可知论的错误是：他们仅看到了世界运动进化的无限性，而未认识到人类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人类自具无限之天能，宇宙自有无尽的物力，以无限之天能求无尽之物力，当可自处其生，使之裕如而得养……”^{②1}他强调人类可以不断认识进化着的客观世界，并改造客观世界为自己服务。他认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无限能力是由人类的世代延续和知识的世代传播为前提的：“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②2}“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②3}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精辟分析到：“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②4}将李大钊与恩格斯的论述做一比较，我们发现它们是何其相似。正是这种基于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可知论，从认识论的角度鼓舞李大钊同志不懈地探索自然、社会的奥秘。

李大钊早期对认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对真理问题的较深入探讨，这是他较陈独秀、鲁迅等同时代先进思想家深刻之所在。

李大钊在《真理与权威》中明确讲道：“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②5}“吾人今时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毋宁信真理。”^{②6}何为真理呢？他认为真理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就是与事实相符的言论。

李大钊对“何为真理”的回答，是同其关于真理检验标准一起提出的。他在《民彝与政治》的前一部分讲道：“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民彝苟能得其用以于事物之实，而如量以彰于政，则于纷纭错综之间，得斯以为平衡，而一一权其畸轻畸重之度，寻一至当之境而止。”^{②7}这即是说，民彝——人民的意志、言论——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广大人民赞同的就是真理。这种理论虽然对于批判崇拜圣人、独裁者有重大实践意义，但由于它以“意志”为标准，仍未跳出唯心主义范畴。他一年后写的《真理之权威》中已经认识到自己上述观点的错误，认识到不应以众人是否赞同来判定真理：“言论之挟有真理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而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②8}即然社会的普遍赞同与否不是判别真理的标准，那么何为标准呢？他回答道：“吾人执笔以临社会，其当拳人服膺、严失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盖背乎逻辑之推论，苟为根于事实而设者，视合乎逻辑之推论，其所据全属于虚者，厥失为少。盖事实确而推论妄者，有时而或可合，推论正而事实虚者，则永世而无其果。吾人论事析理，亦仅求其真实之境而已。……”^{②9}这即是说，真理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我们判定一种理论是否合于真理，即要看它是否合于逻辑，也要看它是否合于事实，这二者中是否合于事实更重要。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②⑩}李大钊同志早期未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由于他强调判定一种理论是否有真理性主要看其是否合于事实，他也就走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门前，向前一步就会破门而入。因为，判定一种理论是否合于事实，只有通过千百万人的实践。

在李大钊看来，真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事物的不断变化，人们对事物的正确反映也在不断的进化：“所谓真理者，亦有从世运而变迁者乎。”^{②⑪}并且，随着人类生活的逐步演进和人类对于自然、社会认识的逐步发展，人们对于旧有的理论也会重新加以评价。他反复列举了苏格拉底、托尔斯泰、墨翟等人生前不为人重视，死后却被人们所赏识的事例：“托尔斯泰，世尝尊为文豪大哲者，而前曾受破门之宣告矣”。^{②⑫}“扬朱为我之说，墨翟兼爱之旨，固二子所信为真理者也，而孟轲之徒，则距之辟之，不遗余力，以无父无君罪之为禽兽。然自今日观之，其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矣。”^{②⑬}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此可知邪说之未必果邪，淫辞之未必果淫。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也。”^{②⑭}

李大钊同志也认识到人类认识真理是艰难的，一方面“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曩乎其难！”^{②⑮}一方面人们由于经历、社会条件不同，往往对同一个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他坚信，这种艰难“不足以障真理之表显”，^{②⑯}只要我们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勇于探索进化着的万物万事，并注意交流相互探索的结果，反复验证其是否合于“事实”，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认识真理。

如果说李大钊同志早期在自然观方面给我们的启示不够深刻，那末其认识论给我们的启示则是深刻的，它使我们看到他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李大钊同志对辩证法诸观点的探索广度与深度，在同时代的先进思想家的行列中也是显得十分突出的。其笔锋涉及到辩证法诸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事物的普遍联系与进化，事物的进化是新旧事物更替的过程，矛盾是普遍的，绝对与相对、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是物质世界的根本法则。

在他看来，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与进化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如时间上的过去、现在、将来相互联系，构成一个进化的系列。联系与进化是任何事物所不可避免的：“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②⑰}就是所谓“圣人”，也不能阻挡这种进化：“自然的势力之演进，断非吾人推崇孔子之诚心所能抗，使今日返而为孔子之时代之社会也。”^{②⑱}

与上相联系，他将事物的进化过程视为新旧事物相“代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必然的。“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盖。”^{②⑲}他列举了种种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陈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②⑳}他看到新旧事物的“代谢”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有一番艰苦的奋斗：“大凡一新生命之诞孕，必历一番辛苦，即必需一番之努力。”因此，他号召人们“不避辛苦，断头流血”以促新事物之

产生、发展。^④他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有些人在研究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时，只注意到其只言片语，断定李大钊早期仍未脱出“宇宙循环论”的巢穴。^⑤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至少是未对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加以系统的研究、比较。

事物是进化的，进化过程是新旧事物的代谢过程，那么促使事物进化、新旧代谢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大钊同志力求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统一来回答问题。他认为，整个世界充满了矛盾，“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孕即有虚，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⑥就自然现象来讲，他主要揭示了动静、阴阳、生死、青春白首等；他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现象，如重服从尚保守的“法”（即封建礼法）与重自由尚进取的“理”之间的矛盾。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全面分析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及其原因，并总结说：“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即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静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⑦将李大钊在这里的论述同其前面的论述结合起来，可以看出，他这里讲的“时时调和”“时时融会”并不是指“要取消矛盾”，而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所讲的“调和”的结果，也不是取消相互矛盾着的事物，而是强调要促成一种吸取了矛盾着的事物双方优点弃其缺点的新事物。

1918年上半年，李大钊的多篇文章谈及了“调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调和之法则》。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自然、人生之种种对立的事物中均充满着“调和”（渗透）：“美因缘，人之所乐求也，然当知因缘之最美者，皆由男女两性调和而就也。饮食男女如是，宇宙现象一切如是，即政治亦罔不如是。”“盖遵调和之道以进者，随处皆是生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也。”^⑧他将目光从思辩的领域转向现实生活的领域时，也看到了事物相互渗透，转化从而产生新事物的艰难：“调和之境，虽当宝爱，而调和之道，则不易得也。”“调和之说，初告本甚可贵，而思之不慎，辩证不明，则误解相承……”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严格区分了真假调和，指出真正的调和不是不要斗争，“一言调和，即当捐禁竞争”是假调和。^⑨

可以说，李大钊同志关于矛盾双方相互“竞争”（斗争）、相互“调和”（渗透、转化）的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另外，李大钊同志还花费了较多笔力探讨了事物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宇宙“无始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⑩他认为，“此绝对之说也。”^⑪但是，“若由相对观之”，宇宙又是有限的，“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⑫他强调，观察事物就应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观点统一起来，这样才不致于走入片面。

李大钊同志关于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论述，集中体现于他对时空、人类认识能力两个问题的探讨中，主要见于《青春》、《真理之权威》等文。这是李大钊较同时代先进思想家深刻的有力佐证，也是他迅速转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由上可见，李大钊同志在1918年7月之前，在自然观、认识论、发展观方面，受进化论影响极大，他将“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这一著名论点贯穿于自然观、认识论、发展观

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进化唯物论体系，这种进化唯物论既不同于朴素唯物论、机械唯物论，也不同于庸俗进化论，它是包含着初步唯物辩证法因素的哲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领域最先进的思想体系。^⑤因此，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李大钊同志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哲学家，他转向马克思主义除了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之外，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这个思想根源便是进化唯物论。

注释：

① 参见《汉书·董仲舒传》，《汉书》卷五六，第2518—2519页。

② 严复：《原毁》，《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1957年版，第456页。

③ 康有为：《诸天讲》卷二。

④ 参见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

⑤ 鲁迅：《坟·人之历史》。

⑥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⑧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六上。

⑨ 康有为：《大同书》第3页。

⑩⑪⑫⑬⑭⑰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9、93、95、94、96页。

⑬⑭⑮⑯⑰ 同上书，第66页。

⑱⑲⑳㉑㉒ 同上书，第52页。

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同上书，第84、93、94、86、41、86—87、88、43—44、80、97、70、

64页。

㉞㉟㊱ 同上书，第87页。

⑮ 鲁迅：《呐喊·自序》。

⑰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15页。

⑲ 严复：《天演论·论十·按语》。

⑳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㉔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⑳ 参见雷民：《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概述》。

㉒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

㉔㉕ 李大钊：《调和之法则》，《言治季刊》第3册。

⑳ 当时中国的最先进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进化唯物论，如陈独秀、鲁迅。关于进化唯物论在中国哲学长河中历史地位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暂不作深入的探讨，将另有专文论及这个题目。